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

罗积勇 肖金云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 主编 陈文新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湖北省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文华学院博士基金资助项目成果

《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

罗积勇 肖金云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罗积勇,肖金云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12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17357-6

I. 礼… II. ①罗… ②肖… III. ①韵书—中国—宋代 ②《礼部韵略》—研究 ③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H113.6 ②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5067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6.25 字数: 352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7357-6 定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傅璇琮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海峰 刘爱松 陈文新 陈水云

张思齐 罗积勇 周 群 赵伯陶

陶佳珞 黄 强 詹杭伦 霍有明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考试与教育三百》，《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36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数。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

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① 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1256）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泰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璉、周鏜、聂炳元、刘耕孙、丑间、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①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兵起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②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泰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徠，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它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

^① 赵翼著，王树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②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① 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② 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继续得到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科举制度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33页。

^② [美] 吉尔伯特·罗曼兹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635页。

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祯《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元登科记保存稍多，明清有关文献尤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世奇编《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余篇，清文1集，选文290余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元明科举与文学考论》、《游戏八股文研究》、《明代八股文选家考论》、《唐代科举与试赋》、《〈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等。我们这套《中国科举文化通志》，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科举文化通志》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先生等在学术上给我们提供了若干指导；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15年4月13日

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礼部韵略》概貌	7
第一节 《礼部韵略》与其他韵书的关系	8
一、《礼韵》与《集韵》的关系	9
二、《礼部韵略》与《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的关系	10
三、《礼部韵略》与《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关系	11
第二节 《礼部韵略》的版本	12
一、无增修、互注的《礼部韵略》版本	12
二、含新制的《礼部韵略》版本	12
三、兼含有新制与私制的《礼部韵略》版本	14
第三节 沟通《礼部韵略》与科举的书：《押韵释疑》及《增修校正押韵释疑》	14
一、《押韵释疑》	15
二、《增修校正押韵释疑》	31
三、《押韵释疑》与《增修校正押韵释疑》的关系梳理	33
第二章 《礼部韵略》的收字及其修订	38
第一节 敕准增补字及《礼部韵略》的历次修订	38
一、元祐五年(1090)孙谔订补 52 字	39
二、绍兴十一年(1141)年黄启宗增补 245 字	39
三、绍兴十三年(1143)年黄积厚增补 2 字	40
四、淳熙二年(1175)张贵谟上表补 134 字	40
五、乾道八年(1172)增补“歧”字义项	40
六、嘉泰四年(1204)增补“原委”	40
七、嘉定十六年(1223)吴杜增补 3 字	41
第二节 《押韵释疑》对“新制添入字”的编排处理	41
第三节 对“新制添入字”的分类分析	46

一、异体	46
二、因假借和古今字而形成貌似异体者	49
三、增异义,音仍同	52
四、增异音,义仍同	52
五、异义异音	52
六、增未收之字头及其义项	59
七、许与某字或某韵某字通押	62
第三章 《礼部韵略》的又音	67
第一节 又音情况介绍	67
一、又音	67
二、又音分类分析	68
第二节 本章所讨论的多音字范围说明	76
一、主要讨论的多音字以《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为底本	77
二、和初版字无关的纯增字不在讨论范围	77
三、新制所增与初版某字音义有关的字纳入讨论范围	77
四、私增字如果与上述论题有关亦纳入讨论范围	78
第三节 又音部分校勘	78
一、反切上字或下字不同	78
二、又音反切字形讹误	79
三、又音反切用俗体代替正体	81
四、反映实际语音变化的又音反切	81
五、误注多音字	85
第四节 异读来源	85
一、《礼部韵略》音义项初设时的依据	86
二、异读的语音层次	87
第四章 宋代科举及科举诗赋的评判标准	93
第一节 宋代科举中的各级各类考试及考试的内容	93
第二节 现存宋代律赋和试律诗概况	95
一、省题诗	96
二、科举赋	99
第三节 《礼部韵略》是科举考试各文体在程式、避忌和用韵上的标准	102
第四节 宋代科举考试中考官对诗赋作品的评判	103
一、宋代科举考试中考官对诗赋作品的评判标准和取向	103
二、考官判定与学理性之间的关系分析	107

第五节 《押韵释疑》中所见科举诗赋押韵宜忌及考场纠纷	109
一、资料列举	109
二、《押韵释疑》中记载的科考史料类型分析	132
第五章 《礼部韵略》又音字和多音多义字规定的执行情况个案分析	135
第一节 韵字分析	136
第二节 小结	190
第六章 《礼部韵略》与科举诗赋考试的互动	192
第一节 主考方、考生的互动及由此对《礼部韵略》修订产生的影响	193
第二节 学者对《礼部韵略》的研究及其对考生、考方的影响	194
第三节 《礼部韵略》的不合理规定及考生的出韵、落韵与适应	198
一、规定有不合理之处	198
二、现存考生科场考试卷子和平时拟作中的误押	204
三、考生科场《礼部韵略》运用精熟的原因探讨	210
第四节 出处与泛押	212
一、经书音义的权威性	213
二、出处与泛押之争	214
三、出处与泛押的分类	216
四、适用“泛押”的条件	217
五、因泛押而误押例	218
结论	221
参考文献	224
附录一 宋代科举诗赋中的文、欣韵同用考	229
附录二 楼钥律赋用韵考	235
附录三 宋代科举考试中律诗、律赋“落官韵”问题	242
后记	247

绪 论

两宋有两百多年里科举是要考诗赋的^①，其用韵以国子监颁布发行的《礼部韵略》（《礼韵》）为标准。《礼韵》又称“监韵”，是举子科场必须遵守的用韵标准，也是考司限韵、评判的依据和标准。它兼有审音、“广文路”的功用，但其音韵学的功能稍有削弱，主要为广大举子押韵作文提供参考。因其简洁便携，具有较大的实用性而备受青睐。《礼韵》作为官方修订的用韵标准，极具权威性，举子必须遵守，诗赋落韵有被黜落、“犯不考”的风险，《韵略条式·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20项“犯不考”的说明中，大部分与用韵有关。考官看详亦需严格执行官韵标准，稍有不慎便会引致纷争，甚至会受到处分，故亦持审慎态度。长期以来《礼韵》并未受到音韵学家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礼韵》系韵书，以《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和《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增韵》）为主，日本真福寺北宋刊本《礼韵》面世后亦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礼韵》与宋代科举的关系虽也有学者注意到，但总体上看，研究得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一、作为科举法规书的《礼部韵略》

1. 《礼部韵略》的作用及价值

《礼韵》作为官韵，其收字、字形、字音、释义等都是经官方批准的，极具权威性，刊布流传甚广，对宋人影响很大，是我们研究宋代语言的宝贵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其他韵书如《广韵》、《集韵》、《古今韵会举要》等提供参考，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礼韵》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科举，作为作文和衡文的在押韵和定平仄等方面的依据。除此之外，在宋人日常生活中也得以广泛运用，或用之于日常诗文用韵，或引之校勘古书讹字，或引之辩驳误用，或引之训释名物等。具体说来，《礼韵》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礼韵》与《广韵》、《集韵》等韵书关系密切，对研究这些韵书亦具有参考价值。《礼韵》因科举诗赋用韵而产生，其刊布流传具有权威性、广泛性、连续性，它的一些特点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之后的韵书。

^① 除去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绍圣时期、崇宁废科举的数十年。

(2)《礼韵》不断地受到官方和私人的增修，一些音切发生改变，与《广韵》、《集韵》不合，部分特殊音切、转移小韵反映了宋代实际语音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宋代语音的宝贵资料。

(3)《礼韵》具有较强的法定性，官方对其音义、字形等都有严格、明确的规定，对科举产生深远影响，对宋人实际语言运用特别是书面语言运用影响极大。

2. 《礼部韵略》并不完全符合宋代实际语音

《礼韵》属于《切韵》系列中的韵书，相对《广韵》、《集韵》而言，它作了删削，但删削没有明确的标准，只有一个简化使用的意向。这样，《切韵》系列韵书，特别是《广韵》、《集韵》中原本不合理的东西大多得到继承。首先，韵部划分基本不变，独用、同用的规定也基本与《广韵》、《集韵》相同，那么，决定了《礼韵》在韵部划分、具体字的归韵上与现实语音大有隔阂。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卷第八“《礼部韵略》非理”反映了这种隔阂：“《礼部韵略》所分字有绝不近人情者，如东之与冬，清之与青，至于隔韵不通用，而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然终为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韵中，仍义训不一。顷绍兴三十年省闈，举子兼经出《〈易〉简天下之理得》赋，予为参详官。有点检试卷官蜀士杜莘云：‘简字韵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尔，如杂物撰德、体天地之撰、异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屦之类，皆不可用。’予以白知举，请揭榜示众，何通远谏议初亦难之，予曰：‘倘举场皆落韵，如何出手？’乃自书一榜，榜才出，八厢逻卒以为逐举未尝有此例，即录以报主者。士人满帘前上请，予为逐一剖析，然后退。又静之与靚，其义一也，而以静为上声、靚为去声。案《汉书》贾谊《服赋》：‘澹虐若深渊之靚。’颜师古注：‘靚与静同。’《史记》正作静。扬雄《甘泉赋》：‘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静字耳。’今析入两音，殊为非理。予名云竹庄之堂曰‘赏静’，取杜诗‘赏静怜云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频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静字左傍乃争字，以故不定叠。’于是撤去元扁而改为靚云。”

洪迈上面这段话，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韵的分合与现实语音相左；二是字的归韵与当时读书音不符或与古注相左。结果导致明明可押的不能押，而按现实语音已经不谐合的字却要归到一起押。

总之，在归韵、又音和多音多义字上产生了许多矛盾。如果《礼韵》对某字的规定尽管与现实语音有龃龉，但本身是明确的，考生还可靠死记来对付。但对于《礼韵》中那些前后规定自相矛盾，或《礼韵》规定与经典注音释义有出入，或经典中有而《礼韵》中无，当考生行文触及这一部分时，则会引起纠纷与矛盾，从而导致许多变通规定的出现，导致《礼部韵略》的修订、微调，等等。这些是本课题要研究的。而研究的重点是《礼部韵略》中又音、多音多义字规定与实际的执行情况。

3. 《礼部韵略》多音字情况及其价值

《礼韵》多音字是指《礼韵》中有两个及以上读音的字。这些异读音包含了从远自先秦近到北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形成的不同层次的语音材料，兼及读书音、方言和古

今音。《礼韵》原有异读字 1331 个，异读音约 2687 个，大部分无注，《附韵》明确注明出处的有 1869 个，为我们区分异读来源和考察、划分异读层次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礼韵》与《集韵》关系密切，二者相同音切达到 80%，对《礼韵》语音层次进行分析，总结不同层次异读的来源及演变规律，不仅能更好地研究《礼韵》自身特征，亦能为研究《集韵》异读、认识《集韵》音系性质提供参考。

《礼韵》多音字成分复杂，从音上来说，主要可以分为同义异音字和异义异音字，以音变构词的形式呈现的异读音最多，古今字、通假字和部分特殊同形词亦能形成异读音。同义异音词虽不辨义但保留多个音切，《礼韵》不删去此类异读，一来保留了前人丰富的异读音，是尊重历史的表现，二来为考生押韵调平仄提供了回旋的余地。《礼韵》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大量删简多音字的音项和义项，并在科举中大力推广，对宋人以及后世汉字音义的简化、固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对多音字音义规定在科举诗赋中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的研究价值。

科举制度与韵书关系非常密切，宋代尤甚。目前国内有关《礼韵》的研究渐多，主要为探求《礼韵》本身特点，而少有将之与科举实践结合起来，并在科举实践中寻求、验证《礼韵》规定音义的具体执行情况的研究。为数不多的有关《礼韵》和宋代科举的研究，亦多停留在二者关系的浅层次分析上。同时，科场中，考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对《礼韵》以及经书熟练程度、宋代现实语音和自己方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诗赋用韵中出现一些违背《礼韵》规定的现象，这是我们研究宋代语言的宝贵资料。目前也少有从这方面来进行的研究。

本书计划从《礼韵》中具有代表性的多音字的角度，分析其音义特点，并结合宋代科举诗赋的具体用韵情况，以及宋代实际语言特征和考生的语言背景，探讨《礼韵》作为官方韵书的的价值，探讨《礼韵》多音字音义规定与其执行之间的关系，考察《礼韵》对科举实际用韵的影响以及科举实际用韵对《礼韵》的影响，更深入地探讨韵书与科举的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以上分析说明本课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根据现有资料，将《礼韵》多音字音义规定与科举诗赋用韵结合起来分析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并可预期有创新性的结论。

二、研究现状

相对于宋代其他韵书，《礼韵》研究环节比较薄弱，专书研究更少。宁忌浮先生《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分专章详细研究了《礼韵》，并与其他韵书进行比较，详细考察了《礼韵》的来源、韵部及同用独用例、部分小韵的归部、小韵和韵字数目及其排列次第、反切和释义、韵字增补等情况，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及新见，如《礼韵》对研究其他韵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认为《礼韵》是《集韵》未定稿的简缩，景祐《韵略》与景德《韵略》无传承关系等。^① 李子君先生对《礼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涉及《礼韵》、

^① 参见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第二章“《礼部韵略》考”，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附韵》以及《增韵》的版本、年代、异读、流布、功用等诸多方面，方法可靠，有不少新见。其《〈礼部韵略〉异读研究》、《〈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又音讹误考订》等文章通过比对校勘，对《礼韵》各版本反切、异读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为《〈礼部韵略〉研究——真福寺藏〈礼部韵略〉与〈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通过真福寺本《礼韵》和《附韵》详细地考察《礼韵》诸多方面的问题。^① 万献初先生《〈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互注”异音考析》一文对《附韵》又音进行精细的数据统计分析，对多音字组进行了细致的音韵分析，以专名音变、音变构词、兼项音变别之。张渭毅先生《再论〈集韵〉与〈礼部韵略〉之关系》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二书的关系，提出《礼韵》是《集韵》未定稿简缩并稍作修订而成的新看法。其《〈集韵〉异读研究》考察了《集韵》异读来源，并对异读层次进行解析，对我们研究《礼韵》异读亦有借鉴作用。杨春俏先生《宋代〈礼部韵略〉官方修订史考述》主要考述了《礼韵》几次官方、私人增修情况。国外，日本有几位学者有相关研究，如水谷诚《关于真福寺本〈礼部韵略〉》、《〈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的祖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索引稿》等，平田昌司《唐宋科举制度转变的方言背景》考察了科举与方言的关系。以上有关《礼韵》的研究中，专门针对异读进行研究的甚少，主要有李子君先生、万献初先生。张渭毅先生研究《集韵》异读的方法和理论值得我们借鉴。

再说宋代科举诗赋的研究状况。两宋 300 余年间共设 118 科，除去神宗、哲宗绍圣和徽宗年间约 50 年不考诗赋外，其余年间均考诗赋，科举诗赋当是十分丰富，蔚为大观。但目前为止，有关宋代科举诗赋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是因为宋代科举诗赋保存不及唐、清完好，且多被认为研究价值不高。《押韵释疑》、《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中辨音时引用了一些科场赋作用韵及争议问题考官看详的例子，是极其宝贵的资料。傅璇琮主编的《宋登科记考》主要是搜罗宋代历榜登科人员情况，较少涉及科场诗赋及其用韵情况。《全宋文》和《历代赋汇》中收录了一些宋人律赋，包括一些科场赋和拟作，是本书所涉赋作的主要参考资料。曾枣庄、祝尚书、周兴禄等对宋代律赋、科场诗赋有一些文体上的研究。曾枣庄《论宋代律赋》一文讨论了宋代律赋的内容、限制、演变，以及诗赋考试与律赋对宋代文学的影响。祝尚书在《宋代科举与文学》和《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二书中详细考论了科举与诗赋的关系以及科举诗赋的特点、内容和价值；其《论宋体律赋》一文认为宋体律赋综合评价虽不高，但其形式美（音韵、文字运用）仍是一笔可资借鉴的遗产。周兴禄《论宋代科举的解试与省试诗》、《论宋代科举殿试的诗赋作品》，搜集辨析了宋代科举中的解试与省试诗、殿试诗赋作品，但不够全面。以上关于宋代律赋和科场诗赋研究多是从文体上进行研究的，少有从用韵方面进行研究的文论和著作。胡建升《从唐宋科举诗赋用韵看〈广韵〉“文欣”同用的起始时间》一文，通过分析唐代和宋代科举诗赋作品的用韵情况，认为“文欣”同用始于景祐四年（1037）官韵修订，《广韵》

^① 李子君尚有多项关于《礼部韵略》的专项研究，如“宋代韵学史研究——《礼部韵略》系若干韵书之原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礼部韵略》研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等。